

北狄与匈奴

马长寿 著 ■ ■ ■



北狄与匈奴

马长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狄与匈奴/马长寿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ISBN 7-5633-6047-6

I. 北… II. 马… III. ①狄-民族历史-研究
②匈奴-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5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5.5

字数:11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4 500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马长寿（1906～1971），字松龄，山西昔阳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一九三三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在中央博物院工作，多次深入四川西部进行民族调查，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此后，又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一九五〇年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一九五五年调入西北大学任教授，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南京。主要论著有《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彝族古代史》、《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报告》、《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即出）、《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 ◆ 北狄与匈奴
- ◇ 乌桓与鲜卑
- ◇ 氐与羌
- ◇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 ◇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 ◇ 汉赵国史
- ◇ 敕勒与柔然
- ◇ 南凉与西秦
- ◇ 吐谷浑史
- ◇ 唐代党项

组稿编辑：张 静
责任编辑：杜桂玲
责任质检：张 静
装帧设计：孙豫苏

总 序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

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6~1971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

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氐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氐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幹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幹《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干志耿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氐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

《丛书》所辑的另外五部著作,是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指导的研究生周伟洲教授所撰写。周伟洲,男,一九四〇年生,广东开平人。一九六二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师从马长寿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方向是藏族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时代的变化,改革开放冲破了过去学术的某些禁区,创造了更为优越、宽松的学术条件和环境,因此,他在八十年代撰写、出版了一批中国民族史方面的论著。《丛书》中收入了他的五部著作,《敕勒与柔然》是研究自匈奴、鲜卑之后,雄踞于北方大漠南北的敕勒(高车)和柔然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尚属首次。《南凉与西秦》和《吐谷浑史》两书,则可视为鲜卑族(部分)迁徙到西北地区后,建立政权及开发西北的论著;《汉赵国史》则是南匈奴在中国内地建立政权及最后融入汉族的研究著作。以上三书均可

以说是在其老师马长寿教授过去论著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入。《唐代党项》一书,主要论述唐和五代党项族的历史,无论从中国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来讲,此书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据近年来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又作了一些修订和增补。

《丛书》虽名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实际上仅限于公元十世纪唐五代以前北方(包括东北、西北)主要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按照马长寿教授生前的计划,是要按时代先后一本一本本地撰写十余种中国古代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在他逝世前,正准备着手撰写《吐蕃史》,然而,不幸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学生们则因学术水平和能力所限,也无力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只有希冀于后辈学者们继续努力了。就是《丛书》所辑的十部著作,因出版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术的进步,现在看来,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丛书》所辑的十部著作,因出版时代较早,印数不多,印刷质量欠佳,学界同仁和研究生们希望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长寿教授的著作能再版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精心策划,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为名,再版上述著作,嘉惠学林,功不可泯,特致谢忱!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简短前言

预先声明,这是我十多年来在各大学讲授中国民族史讲稿的第一章。原稿比较简略一些,通俗一些,近年时加修改,略微带有一点研究性质,但原来通俗的地方仍然留着。本书的主题是讲匈奴史的。但在中国史上,匈奴以前有北狄,当春秋、战国之时,北狄在中国史上的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讲匈奴必须先讲北狄。继匈奴之后,与匈奴融合在一起的部落部族很多,例如铁弗(伐)部匈奴、独孤部匈奴、拓跋鲜卑、秃发鲜卑、卢水胡等,最后还有稽胡。因此在匈奴史上都应当提到,只拓跋鲜卑和秃发鲜卑在此仅提一下,其详细叙述当在鲜卑史内,自不待言。本书以“北狄与匈奴”为名,只是说匈奴以前有北狄,此外并无其他用意,亦应当声明。

匈奴史是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主题。本书叙述自然只叙述中国史上的匈奴。匈奴人的起源虽众说纷纭,但《汉书·地理志》记:“朔方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朔方在今包头市北部略偏东,自此而西北得头曼城,则头曼城在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的阴山山脉之内。因此我们说匈奴部落联盟盟主头曼最初即活动于阴山之内固无不可。匈奴建国之时,单于的牙帐虽设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阿尔浑河右岸,古之所谓“龙庭”,但其国疆域,东至辽东平原的西部,北至贝加尔湖,西至西域的天山南北各地,南至长城地带,大部分是属于中国今日的领土。不仅如此,从远古的部族往

来、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来说,匈奴和华夏的关系最为悠久,最为频繁。晚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学家在贝加尔湖附近和蒙古草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便可充分证明此点。而且自西周以来,跟匈奴关系密切的北狄部落集团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部落联盟和小国;匈奴分裂以后,它们的统治阶级率领草原的各族牧民南下降汉,在五胡十六国时建立了前赵、夏国和北凉三个临时政权的国家。因为上述各种缘故,所以我们应当把匈奴作为中国古代的少数部族之一在中国民族史上大书特书,详细阐述它们盛衰兴亡以及各族相互融合的历史。

匈奴在中国史上的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它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发生过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密切的关系,又一方面是由于它和跟它同时迁入中原的各族在不同时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俱融合于汉族和其他少数部族之中。过去我国的史家过分强调匈奴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强调匈奴统治阶级的侵扰和掠夺,忽视匈奴人民的辛苦劳动,忽视匈奴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更忽视匈奴以及与匈奴有关各族同汉族人民在一道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联合斗争和起义运动。现在看来,这种态度是有偏见的,是反历史主义的。

一个正确的历史主义者应当按照当时、当地匈奴和汉族之间的真实关系叙述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历史。当匈、汉划疆为界、各自为政之时,它们之间有过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有过和亲与睦邻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古代匈奴和汉朝同在今天新中国的版图之上,其间当无侵略与被侵略之可言。这种论断是超时代的想法,不合于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匈、汉人民之间,匈奴牧民被匈奴单于所胁迫,汉族农民被汉朝皇帝所愚弄,曾经进行过多年的民族战争,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些战争,正义是属于汉朝的;有些战争,正义是属于匈奴的;又有些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只可称之为民族大混战。因之,对各时期的各个战役要加以具体的分析。匈、汉之间的战争,一般言之,是由于国家政权的矛盾,由于汉朝封建主和匈奴奴隶主两者利益冲突的反

映。匈奴奴隶主要掠夺人口,掠夺黄金、缯、絮、米、糒;汉朝封建主要扩充土地,抢劫战马,要禁止关市与胡人贸易,要使匈奴王朝屈服于汉封建王朝之下,这些都是匈、汉战争的根源。至于匈、汉人民,即匈奴的牧民和汉朝的农民,他们各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从事于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只需要和平,不需要与邻国邻族进行战争。在两国牧民和农民之间,为了增加生产资料和调节生活资料,他们可以进行关市贸易;为了获得粮食,匈奴需要入塞垦田,等等,所有这些和平往来、团结互助、公平交易等都是两国人民之间主要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由两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只有当敌国统治阶级掠夺他们的人口、土地、牲畜和财富的时候,只有当敌国统治阶级禁止他们关市交易、往来垦田以及危害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时候,两国人民始愿意参加民族战争。总之,当我们处理两国分立之时的民族关系时,既要顾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要顾到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合于正确的历史主义。

自从匈奴南下降汉,成为国内的少数部族之一以后,此时国家的界线消失了,他们和汉族统治者的关系是臣民对统治者的关系,和汉族人民的关系是兄弟部族的关系。此时只有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而无国家关系。在东汉、魏、晋时期,汉族统治阶级对匈奴以及其他少数部族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实行分化离间政策,并且剥削奴役匈奴人民,使一部分贵族沦为“土家”,使牧民变为农奴和佃客,还有一部分沦为奴隶,结果遂引起了于扶罗单于的叛变、右贤王刘猛的出塞、刘渊所领导的复国运动以及汉人汲桑和羯胡石勒共同发动的苑马牧人起义,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包含着阶级关系和部族关系,我们应当有区别地给以分析和讨论,而不能千篇一律地简单地归结为都是起义运动,或者都是非正义的战争。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和国内其他的少数部族的上层贵族取得了政权,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临时政权的国家。他们也跟汉族的统治者一样,对于汉族以及其他部族进行奴役和剥削,结果也

引起了多次的汉族农民起义,有冉闵领导的石赵宫廷暴动和随之而起的胡、汉大屠杀,还有以“东宫高力”为主体的胡、汉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所有这些事件也都包括着阶级关系和部族关系。有的以阶级关系为主,部族关系只是作为一种因素蕴藏于各种事变之中,例如汉族农民的起义便属于此类。有时以部族关系为主,阶级仇恨则借助于部族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冉闵所领导的宫廷暴动便属于此类。遇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应当分别地给以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是起义或者都是无原则的叛乱。

各部族、部落的融合以及诸部族、部落的汉化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关于部族融合和汉化的规律,我们知道的很少,正在开始研究。在匈奴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苗头,即部落、部族、民族都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一切部族,从它的祖源看,单独由一元的祖宗部落演化而来的似乎没有或者很少,绝大多数是由多元的祖源不同的部落合并在一起而后形成的。部族一经形成以后,在许多不同条件下又分裂为许多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跟原来的部族名称相同,有的则跟原来的部族名称迥异,常使后世的人们有所滋惑,因而必须下一番正本清源的考证工夫,对于它们的祖源始能交代清楚。此外,在更多情况下,是分裂以后的部族、部落跟祖源不同的其他部族、部落相互融合,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或部落集团。这种现象,我们在匈奴史和鲜卑史上经常看到,不足为异。例如当匈奴国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降汉以后,匈奴一个部族便分化为许多部族。残留在草原的匈奴余众,当东部鲜卑盛时,他们有十多万落到辽东与鲜卑杂居,自称为鲜卑。还有一部分匈奴与从草原东北角南下的鲜卑融合,形成拓跋鲜卑和秃发鲜卑。这都是属于鲜卑史上部族融合问题,在此不谈。在草原南部的匈奴,即所谓南匈奴,有的与鲜卑融合,成为铁弗(伐)匈奴,在十六国时建立夏国;有的与河西走廊的小月氏联合或者一部分同化,成为卢水胡或“卢水诸胡”,在十六国建立北凉;有的迁往东北的紫蒙川(今辽宁朝阳县西北)一带,与当地的鲜卑融合,成为宇文鲜卑,此族在北

魏时又与拓跋鲜卑融合,到北朝末年宇文泰建立北周。又在汉时移置于河西、上郡的匈奴,既与以前从西域迁到这里的龟兹人融合,又与后来从并州北部迁到这里的铁弗(伐)匈奴融合,成为稽胡。此族在北朝史和隋唐史上经常看到他们的活动和起义,应是最后一个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部族。从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到匈奴与它族融合的复杂情况。

匈奴和汉人的融合出现最早,而且更为广泛。有的匈奴如两汉时的匈奴降人,其中包括匈奴的王侯、将相、臣民以及奴婢,一开始迁入中原各地如长安、颍川郡和缘边各郡,很快就直接同化于汉族之内了。有的如上所述,他们先与鲜卑、小月氏、西域胡融合,成为铁弗(伐)、卢水胡、稽胡诸族,然后再与汉人融合在一起,成为汉族成分中各种不同的姓氏了。匈奴和卢水胡的名称消失于北魏的中叶,鲜卑和稽胡则在唐代中叶以后始不见于史乘。总之,移入中原和边郡的匈奴及其有关各族无论直接或间接的都同化于汉族了,作为汉族百家姓中的若干姓氏在各地生活着。其中有些姓氏是比较易于省识的,如呼延氏等。但绝大部分的古代匈奴大姓,如刘氏、乔氏、卜氏、金氏、曹氏等,都和汉族的同样姓氏无所区别。这种情况不只现代如此,就在一千多年以前早已如此。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文集自传里称为北周刘亮之七世孙。《周书·刘亮传》谓“亮中山人,父持真,魏领民酋长”。从官衔和地望看,似为匈奴独孤部之刘。但北魏末年做领民酋长的,胡化的汉人亦未始不可,所以诗人刘禹锡的祖先究系出刘库仁之刘、刘渊之刘,抑或刘邦之刘,一时还难骤下定论。千载而上已经如此,近代现代更不必论。

匈奴、鲜卑等族最后都融合于汉族者,原因很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从匈奴等族的汉化倾向言之,大致有以下四个前提:第一,是匈奴等族的内徙与汉族错居杂居,相互往来,首先为诸族间的共同生活打下基础。第二,是游牧部落安土定居。原来的部落组织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汉人的郡县制度。牧民由不定居的游牧经济,先变为定居的农牧经济,最后又变为农业经

济。第三,匈奴、鲜卑诸族虽属于同一大的语系(阿尔泰语系),但部族语言究不相同。他们到达内地以后,无论被汉族皇室统治,或者统治汉族人民,其接触最广泛的,不是其他部族,而是浩如烟海的汉人。所以各部族徙入内地之初,在短时间内还保留着各部族语言,时间一长困难丛生,到了最后各族不得不以汉族语言作为他们的共同语言。第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自愿融合,是各族汉化的主要前提。《太平寰宇记》引《隋图经杂记》一段记载,陕西旧丹州宜川县(今宜川县)西北有一条库碛川。此川以北住的是稽胡,以南住的是汉人。胡、汉人民同居一川,共结香火,相互团结。稽胡语称香火为“库碛”,故以此名川。这段故事正可说明稽胡和汉人为什么能融合而为一族的缘故。

此外,对于匈奴的人种、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想这对于西方汉学家过去所提出的谬论,是有意义的。匈奴立国之时的所有制是奴隶制,这种野蛮的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统治阶级对内部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对外部各国各族进行的侵略战争。近代西方的许多学者说,匈奴的掠夺战争是由于他们是一种野蛮的人种,或者说是由于游牧的生活,这都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

在各个章节里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有的问题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想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希望同志们指正。又前面已经提到,此书原是讲稿性质。既然原来是讲稿,就要照顾到学生的需要,普通的和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讲过的东西也拿来讲讲,目的是使学生开开眼界,继续研究,别无其他目的。

马长寿谨识

一九六一年于西北大学

目次

CONTENTS

第一章 北狄部落和部落联盟	1
一、北狄的意义、分布及其种类 / 1	
二、赤狄、白狄、众狄的部落联盟及其与华夏诸国的 关系 / 8	
三、北狄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 13	
第二章 匈奴国及其与汉朝的关系	21
一、匈奴极盛时期,奴隶主政权的建立 / 21	
二、匈奴衰亡时期与汉朝的争夺战争 / 29	
三、南匈奴降汉,北匈奴政权在奴隶和奴役部落的 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趋于总崩溃过程 / 34	
第三章 匈奴的人种、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	41
一、匈奴是蒙古利亚种 / 41	
二、匈奴的语系问题 / 44	
三、匈奴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 / 49	
四、匈奴的文化和经济 / 56	

第四章	匈奴人入居中国内地作为国内少数部族	
	以后的前期活动	77
一、	匈奴人入居缘边八郡和汉、魏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分化政策 / 77	
二、	匈奴牧民变为汉族封建主的农奴和奴隶 / 84	
三、	晋代初年入塞北狄十九种的初步分析 / 88	
四、	五胡十六国时与匈奴有关的几个民族运动类型 / 100	
 第五章	 匈奴后期活动和稽胡	 117
一、	四、五世纪并、雍等州匈奴等族杂居错居情况和他们的联合起兵起义 / 117	
二、	北朝对稽胡的政策和稽胡的反压迫斗争 / 127	
三、	隋唐时期的稽胡渐次与汉族融合 / 139	

第一章 北狄部落和部落联盟

一、北狄的意义、分布及其种类

公元前三世纪以前,阿尔泰语系部落居住在蒙古草原南部和黄河流域北部的,汉文史书称之为“狄”或“北狄”。

关于“狄”的名称,过去有许多望文生义的解释,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比较合理的,“狄”可能是后世所谓“狄历”或“丁零”的简译,是由“Türk”的原音翻译来的。我们之所以这样想,主要理由除了古代传统的史法,即春秋所谓“名从主人”的义例^①外,试看五胡十六国时的丁零诸大姓,对此问题的认识颇有启发。当时丁零豪帅的大姓有翟氏、鲜于氏、洛氏、仇氏。其中以翟氏为最多,其次为鲜于氏。^②如众所知,古代的“翟”与“狄”是互通的,从丁零

① 《左传·昭公元年》经文:“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公羊传》、《穀梁传》的经文,“大卤”作“太(大)原”。《公羊传》曰:“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太原?地物从中国,邑名从主人。”《穀梁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循此义例,可知“狄”之名乃译自狄人之自称,而不能以汉文义理加以解释。

② 参考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卷八七《丁零叛燕》;汤球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二至四五,《后燕录》中有关条文。